



外教社
博学文库

文言文体与文学翻译

——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适用性研究

Classical Chines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Applicability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Translation
from Foreign Languages to Chinese

陈志杰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文言语体与文学翻译

——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适用性研究

Classical Chines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Applicability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Translation
from Foreign Languages to Chinese

陈志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言语体与文学翻译——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适用性研究 / 陈志杰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外教社博学文库)

ISBN 978-7-5446-1314-9

I. 文… II. 陈… III. 文学—翻译—研究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229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苗 杨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30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314-9 / H · 0534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出版说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服务外语教育、传播先进文化、推广学术成果、促进人才培养”的经营理念,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创新精神,多年来已推出各类学术图书 600 余种,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展示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并为广大优秀的博士人才提供广阔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外教社博学文库”。该文库遴选国内的优秀博士论文,遵循严格的“专家推荐、匿名评审、好中选优”的筛选流程,内容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和教学法研究等各个领域。该文库为开放系列,理论创新性强、材料科学翔实、论述周密严谨、文字简洁流畅,其问世必将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在相关的外语学习和研究领域提供又一宝贵的学术资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前言

所有的翻译实践活动都起于语言,而又止于语言。翻译理论研究根本无法脱离对其物质层面,即语言问题的思考。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文学翻译就是一种语言艺术品的重生。因此,文学翻译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语言艺术的再创造。这种语言艺术的再创造是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背景中完成的,也是借助译入语这一中介实现的。

解构主义思潮把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的语言和文本的对应分析中解放出来,进入了社会文化的广阔空间,使翻译实践的社会性意义和作用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社会文化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操控也成为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已有的翻译实践出发,揭示其中权力的运作情况,并解释译者策略的选择,固然能够帮助人们对翻译活动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但是仅止步于此却是远远不够的。原因有三:首先,这种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单向完成的,其结论源于大量翻译实践的分析和总结。虽然国内许多学者借鉴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多种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史和已有的翻译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这依然无法改变其单向性的特征。因为这种验证性或印证性的研究只能回溯和说明已有的翻译实践,却无法进入未来的翻译实践,即对以后的翻译实践发展作出预测。其次,翻译实践会受到译入语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影响必须借助于译入语才能呈现出来,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语言层面上。把翻译的社会宏观研究与微观语

言层面的研究割裂开来,最终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偏执的。第三,翻译理论的研究不仅仅是要说明翻译实践其所是和译者之所为,还应是反思性的和批判性的,明确指出对其所为和其所是应持何种态度和立场,更重要的是译者对此应采取何种对策。

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翻译这种特殊的人类语言活动。但是,这也并不排斥其另一目的,即指导翻译实践。把翻译纯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切割开来,固然可以明确划分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却有可能将研究的对象人为割裂开来。无论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性理论研究,其对象都离不开翻译实践活动。前者解决的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问题,而后者解决的是改造事物的行动问题,两者共同构成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部内容。没有对翻译实践的深刻认识,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就是盲目的;而没有应用性的理论研究,纯理论性研究也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因此,译学问题研究应该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翻译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相结合。对于文言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研究也就是基于这个构想实施的。

白话文运动是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冲击的结果,最终使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引发了人们对文言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进一步推动了汉语的欧化,加速了文言语体退场的进程。问题是,这种批判并不是在纯学理意义上的,其中掺杂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权力斗争,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力斗争又是中西文化权力斗争从外向内过渡的结果。因此,对文言在文学外汉翻译中的作用反思就必须沿着这条道路来回溯,即从中西文化关系史出发重新反思当年白话文运动对文言的批判,重新理性地思考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对文学语言所带来的影响。反思的目的在于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但同时也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持有足够的警觉,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以正确的心态对待中西文化关系。只有重新回到学理的探讨上来,结合国内的大量外汉翻译实践分析文言的应用价值,尽可能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思考和分析文言适用性问题,才能为提高文学翻译质量寻找到一条可能行之有效的途径。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翻译家大量的翻译实践为论文的撰写提供了足

够多的译例,使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恩师郑克鲁教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反复告诫: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用事实说话。基于此,我收集了大量的译例,出现在论文中的仅为其中一小部分。能拥有翻译家们创造的这样一笔丰富的财富,我深感幸运,也对他们充满敬意。但是,论文是否真的达到了恩师的期望和要求,我至今依然缺乏自信。我还清楚地记得博士论文选题时的情景。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工作的郑克鲁教授在谈到1995年围绕《红与黑》的翻译大讨论时,指出文言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问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文言在文学翻译中到底可不可以用?如何来用?鉴于国内尚无人对此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建议我做一尝试。在随后的论文撰写过程中,恩师还不断给予我鼓励、支持和帮助,使我能够有勇气把这项研究进行下去。

感谢导师郑克鲁教授,也感谢我的另一位师长潘华凌教授。他是我学术生涯的启蒙人,带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长期以来一直十分关心我的成长,并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照。

感谢这篇博士论文的盲审专家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也感谢多位不知名的审稿专家对论文的肯定。感谢杨自俭先生和吕俊先生对该论文的大力推荐。当然,论文最终得以出版,还是要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厚爱。

陈志杰

2008年10月12日

序

陈志杰跟我从事翻译研究三年后,写出博士论文《文言语体与文学翻译——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适用性研究》,获得了好评,“盲审”的结果是双优。自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眼下已成为一门显学。当前,翻译学或译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放在理论方面,因为国外从语言学去研究翻译的著作数以百计,洋洋大观,有的已经翻译过来,由此在国内引发了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看到,关于我国翻译史的专著也出版了不少。应该说,这两方面都是有成绩的。然而,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纯粹的理论研究有时不免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似乎无助于翻译水平的提高,所以不少翻译家不屑一顾,或者隔岸观火般地看热闹。

这篇论文有点像补苴罅漏的尝试,既不完全是理论的阐述,又不是纯粹的翻译技巧探讨,而是两者的某种结合。众所周知,大部分从文言中产生的成语是汉语的精华,在日常生活中、在文章中经常引用出来,就能使说话和文章增添光彩;倘若运用到翻译中,当然也能起到同样作用。即使是欧化的翻译,无疑也是可以运用成语的。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成语往往有特定的含义,用在翻译中是否完全确切?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译者碰到对原文不甚了了之处,索性用一个成语来对付,以掩盖其短。这里也牵涉到直译和意译的问题。既然成语多少与原文有出入,那么,其中的出入应该掌握到何种程度?这算是意译吗?进一步,全部用文言能不能翻译文学作品?用文言语体翻译文学作品似乎有不少成功的例子,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其实大谬不然。今日,如果用文言去翻译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或者长篇小说,大概不会受欢迎。尤其是外国现当代

小说,心理描写、意识流等手法运用得很多,这些艺术手法是非常细腻
的,往往不嫌啰嗦,而文言却是精练的语言,运用到翻译中不免会令人感到不能曲尽其意,会省略掉不应省略的描写。窃以为,林纾用文言去翻译欧美小说,的确用省略的办法最讨巧,逐字逐句的翻译恐怕反而不妙。诚然,用文言翻译散文,似乎问题不大。

论者在文中有意识地建构了一个框架,从文言语体与文学翻译的关系,论述到文言在外汉翻译中使用的可能和必要,再去分析翻译实践中的文言语体,论述得相当全面,而且举出了大量实例。其中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具体的翻译文本分析,对文言语体在翻译史中的几次高潮也作了介绍,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论点。这一构架虽然不能说是完备的创造,却也自成一体。使用文言语体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于有的学者认为,白话文的风行带来了语言贫乏现象,多使用一点文言能有助于汉语自身的建设。论文作者最后的结论是运用文言符合翻译实践、民族语言发展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全文从翻译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去分析,既肯定了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又指出其局限性,这个观点是稳妥的。

陈志杰从事翻译研究已有多年,积累了不少学识和材料。他对中外翻译理论家的观点十分了解,也阅读了大量探讨翻译实践的文章,这样才得以在不算太长的三年时间内完成这部近 27 万字的著作。我期望他在翻译研究中有更多建树。

郑克鲁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缘起	1
第二节 国内外对翻译与文言关系的研究	27
第三节 研究外汉翻译中文言适用性的意义	33
第二章 文言语体与文学翻译	39
第一节 文言语体	39
第二节 文言语体的特点和风格	47
第三节 文言语体与四次翻译高潮	53
第四节 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局限性	60
第五节 文学语言与文学翻译	71
第三章 文言在外汉翻译中使用的可能性	77
第一节 文学翻译的比较性	77
第二节 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	96
第三节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翻译策略:杂合与拼贴	111

第四章 翻译实践中的文言语体 129

ii

第一节 文言与词语翻译 129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中的四字结构 162

第三节 文言语体与文本的历史性 191

第四节 文言语体与文学风格的传译 206

第五节 文言语体与文本互文性 240

第六节 文言语体与回译 274

第五章 结论 304

参考文献 314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缘起

一、文言、欧化与翻译

自从黄遵宪 1868 年提出“我手写我口”，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主要书写形式的文言就开始受到质疑。以黄遵宪为首的“新诗派”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用传统的格律诗形式表现西方思想主题。但是，“旧风格”与“新语句”间的矛盾很难调和。正如梁启超（1889：189）所说，新诗派的诗歌“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他认为，新诗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凌铄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引入外来文化的客观需求促使诗歌的形式发生变革，内容的变革引发了诗歌形式的变化。由于文言及传统诗歌格律难以传达西方的思想观点，于是“新诗派”把目光转向了欧洲的语言形式。在“五四”新文学的前奏中，文言及其传统格律诗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过程中首当其冲地受到抨击。

梁启超在逃亡日本期间创办了《清议报》。其中所刊发的文章多为

“新文体”，有意识地摹仿日本文体，大量采用日本翻译西学时所使用的汉语词汇。这种“新文体”“打倒了所谓奄奄无生气的桐城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从而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导（郑振铎，1934：167）。虽然“新文体”基本上还没有摆脱文言固有的形式和风格，但却显得非常“平易畅达”，“属于浅近的文白参半的通俗文体”（郭延礼，2000：284）。由于在文学创作中大量引用外来词语，汉语于是出现了欧化的趋势。外来语向文言语体的渗透从文言传统的内部开始了对文言文正宗地位的蚕食和颠覆。但是，由于清末保守派古文家极力维护文言的纯正，不断规范文言文的创作，强化清末文言与秦汉时期文言的联系，断绝了文言与白话相互渗透的可能性，这就使得维护语言的纯洁与促进语言革新的两种立场间矛盾不断加大，直至无法调和。文言的历史积淀成了文言发展变化的包袱，而白话却不存在这个问题。

新文学观念的萌芽不仅源于文学语言观的转变，也涉及西方文学形式的引入。梁启超认为，西方和日本等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的进步无不与政治小说的发达有关，因而社会改良必须从小说界革命开始。他翻译了《佳人奇遇》和《经国美谈》两部日本政治小说，试图通过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促进政治变革；教育小说、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等新的小说类型也基于同样的目的被译介进来，一些新的文学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也随之传入我国。文学翻译不但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也直接导致了新的文学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的出现，新的小说、新的戏剧和新的诗歌形式纷纷登台。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又进一步巩固和促进了文学翻译所引起的语言观和文学观的变化。西方的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学格局，对古典文学理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文学翻译使我国文学创作从文学用语、体裁、创作技法到文艺理论都悄悄发生变革，开创了文学发展的新篇章，但同时也挖掘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言文传统间的壕沟，致使文言一步步走向没落，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裘廷梁明确提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因而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郭延礼，2000：295），但“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以及“小说界革命”并没有改变文言的主流文学用语地位,对应用白话文的倡导和提议也仅局限于部分学者的理论思想探讨,甚至提出革命口号的学者们大多还是用文言进行创作。于是,胡适和陈独秀分别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提出以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以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共同发起了“五四”白话文运动。胡适把文言斥为“死文字”,批判了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和拟古主义的做法,强调文学形式上的革命;陈独秀则进一步从文学的思想内容出发,批判文言古典作品中的陈腐思想。与“三界革命”相比,“五四”白话文运动把语言问题与文学创作问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论译书寄陈独秀》一文中,胡适(1993:474)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在这位新文化运动旗手看来,翻译是学习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的唯一途径。至于翻译用语,胡适主张以白话为译入语。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中,胡适以严复、林纾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表明“用古文译小说,也是一样劳而无功的死路,因为能读古文小说的人实在太少了。至于古文不能翻译外国近代文学的复杂文句和细致描写,这是能读外国原书的人都知道的,更不用说了”(胡适,1993:229)。胡适一方面通过自己个人的翻译实践证明白话是国语文学的利器;另一方面通过翻译引入新的词语和表述方法,以丰富白话的表现力。他把译介西洋文学作品看作学习和摹仿西方的文学创作手法,改良和发展文学的国语的必然途径。文学翻译服务于创造新国语和新文学的社会目的和需要。

对于胡适的翻译功能论,鲁迅也大为赞成。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225),所以翻译不但要输入新的内容,还要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从语言与思维方式间的关系出发,考虑翻译的功能和作用。思维方式不同,语言表达形式当然也就有差异。鲁迅认为,中国人的思维不够严谨,不够科学,是因为汉语语法的结构性和逻辑性不够严密。因此,他一直提倡直译甚至是“硬译”,“‘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精悍的语气’,同时

也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已有’”（陈福康，2000：292）。为了使汉语变得精密起来，在文学翻译中汉语必须尽可能放弃自我，向欧洲语言靠拢。于是，欧化成为鲁迅以及其他同时期的翻译家有意识的主动选择。

新文学倡导者们之所以推崇欧化的翻译，是因为他们企图通过翻译引进西方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改造中国文学，借助欧化完善白话文，再造真正意义上的国语文学。傅斯年说，“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需得先使它成为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所谓的欧化，具体表现为“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句法，章法，辞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胡适，1935：223-226）。从现代汉语建设之初，欧化的翻译就成为其主要的手段和内容。文言的退场与文学翻译中的欧化同时进行。欧化不仅仅表现在对西方文学语言形式的摹仿上，也体现在思想内容、写作技巧等多个方面。汉语的欧化从一开始就是全方位的。

欧化的国语只能使白话向西洋文法靠拢才能产生，欧化的国语文学也只能通过形式的摹仿才能成功，可以说欧化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要目标。但是，无论是语言的欧化还是文学的欧化都必须通过翻译才能得以实现，可以说，是文学翻译吹响了汉语现代化的号角，也催生了现代汉语文学。“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的约一个半世纪里，现代汉语跟此前的汉语相比，已然发生了惊人的，不可逆的变化。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汉语嬗变中，最主要的变量，最不稳定的因子，最具冲击力和建设活力的，就是翻译——包括非虚构类作品的翻译——所不断输入的新成分、新词语”（王友贵，2005：161）。西方的理论话语、文体形式和文学语言为建构新的文学秩序提供了摹本和可靠的依据，也为反对古典文学秩序提供了犀利的武器。各种文学译本不但成功地置换了传统古典文学的秩序，还赋予了欧化的白话文学合法的地位。“五四”时期很多诗人把翻译的西方诗歌等同于创作，模糊了译作与创作间的界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虽然创作也是以西方文本为摹仿之母本，但相比之下译本才更接近原作，其合法性和话语的权威性更不容置疑，更能符合“五四”学人的需求，

可更好地表现他们的建构理想。但是,“过分依靠翻译就可能走向极端,即神化西方文化和妖魔化文言文,我们可以从20年代中期《小说月刊》进行语体文欧化问题讨论中看到这一倾向。无论如何,‘翻译’语言和欧化国语重构了‘五四’学人对西方现代文化及中国现代文化的想象”(曹而云,2006:99)。

无论早期的“三界革命”还是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对文言的批判还是颠覆文言的文学语言主导地位,无论西方新思想的传播还是西方文学形式的引进,都唯有依靠翻译活动才能实现。借助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译者成为西方话语的代言人,文学翻译由此以一种蛮横的方式强行介入并主导了汉语的现代化过程。古代白话文逐渐向欧化的现代汉语过渡,其表现手段和能力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提高。白话通过翻译而得以合法化,获得正宗的文学语言地位。翻译活动促使了文言的没落,导致白话取代言文成为主流文学语言。反过来,欧化的白话又在文学翻译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白话于是愈加向欧式语言靠拢。对文言的批判、文言的退场、白话的发展、翻译活动的兴盛等等都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文言与欧化从一开始就处于动态矛盾斗争中,而在其过程中翻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是调和这种矛盾就可能是激化这种矛盾。文学翻译越是接近直译,语言形态就愈加欧化,文言在现代汉语中残留的可能性就愈加小。文学语言越是接近于意译,语言形态就愈加本土化,文言在现代汉语中残留的空间就越发大。翻译使两种文化相遇并交流,也必然导致两种语言文化间发生权力斗争,而这种不同文化间的权力斗争却通过文言与白话间的相互侵蚀呈现在人们面前,因为外汉翻译就是文言与欧化语的竞技场。即使在今天,我们在翻译活动中“必然会遭遇现代语言与古典语言、西方语言与中国语言这样两组语言冲突。这是古与今、中与西的语言冲突。不过,当现代语言必然地吸收西方语言模型,而古典语言总是属于中国的语言时,古今冲突实际上就已蕴涵了中西冲突,而中西冲突往往借古今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王一川,1999:59)。

二、现代汉语中的文言承继

6

自“白话文运动”后,文言作为主流文学书写形式已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言也完全退出了现实生活。事实上,文言书写一直在现实生活与现当代文学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甚至还扮演着某种特殊的角色。现今的司法文书和机关公文中就有不少古汉语词语和句式,书信和交际辞令中的敬语、谦称和婉辞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言的残留。1988年5月邓颖超(1994:389-390)在致宋美龄的信中说:

庐山初识,匆匆五十年矣。山城之聚,金陵之晤,犹历历如昨。别后音讯阔绝四十余年,诚属憾事。幸友谊犹存,两心相同。每遇客从远方来,道及夫人起居,更引起怀旧之情。近闻夫人健康如常,颇感欣慰。

令姐孙夫人生前,极为思念夫人。每每言及夫人爱国情切,必将致大力于中国之统一。孙夫人手足情深,亟盼生前能与夫人一晤;曾亲笔致函夫人,然未能如愿,终成遗憾。尝读夫人之《我将再起》,思感殊多。回首当年,国难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战,促成国内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弘扬抗日民气,救助难童伤兵,厥功至伟……

我亦年逾八十。今虽卸却政务繁荷,然念念不可置之者,为国家统一一端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

由于书信属于非常正式的文体,通常情况下在选词、句法和修辞的方面显得比较郑重严肃。前面的这封书信以浅近的文言写就,通篇音韵和谐,不但典雅,且饱含深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收信人蒋夫人为前民国第一夫人,而邓颖超女士也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夫人。双方地位显贵,言辞决不至于沦为流俗,典雅的文言适合交际双方的身份特征;信中内容涉及国事,文言使该信的表达显得尤为庄重;海峡两岸,音讯隔断多年,语言也因此产生细微的分化,但同为炎黄子孙,文言就成了世界华人相互联系的历史桥梁。文言的使用有效地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引发一种亲切的认同感。

文言之所以能在书信等特殊的应用文体中残留下来,是由文言在历